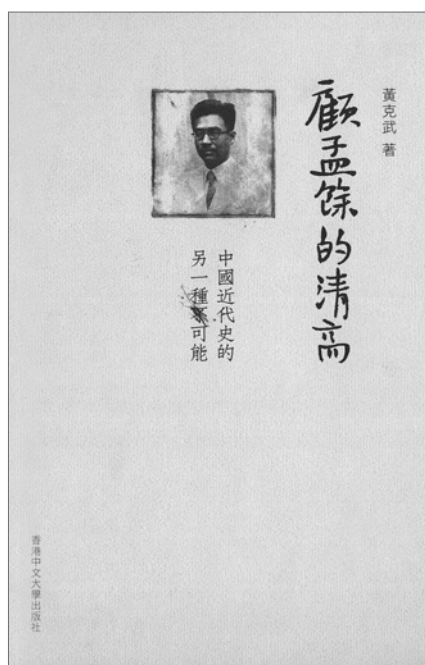


# 把人物傳記帶回歷史研究

## ——評黃克武《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

● 李志毓



黃克武：《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

中國傳統史學是一門重視「人」的學問。自太史公創立紀傳書表以來，「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

述典章經制」。歷代史家，默識前言往行，將有影響的人物之功業、人格、德行、命運寫入歷史；在時會、勢運中，探究其成敗得失，反思其人生意義，昭之後世，使人有所鑒戒，知觀時處變，立身行事，而有所為。這一史學精神依靠紀傳承載，綿延兩千餘年，然而自近代「新史學」興起以來，已漸漸淡出史家的視野。近數十年，受西方社會科學與史學潮流影響，傳記史學更趨邊緣。在西方，「隨着社會科學概念的傳播，在20世紀70年代，只有集體傳記與類型傳記才能凸顯它們的地位，而個人化的生活描述被視作保守的、在理論與方法上屬於抵抗型的類型，最多在心態史方面還有意義」<sup>①</sup>。在中國，回看近二十年的專業史學研究，也發現有深度、有影響力的人物傳記愈來愈少。傳記被交給了歷史小說和通俗讀物，專業史家則更強調在各種「問題意識」之下，搜尋各種「結構」的網環。

論政治地位和歷史影響，顧孟餘都不算「偉大」，但他所牽扯到的各方面關係卻很重要。顧一生謹言慎行，處事低調，且留作不多，為學術研究造成很大困難，故前人著述寥寥。

《顧孟餘的清高》是第一部關於顧孟餘的研究專著，不但填補了相關研究的空白，對於進一步了解汪派和國民黨左派的思想路線與政治性格也具有重要意義。作者打通思想史與政治史視野，深入研究從政知識份子的思想性格與跌宕人生。

雖然學術潮流如此，但人物傳記對於中國近代史、尤其政治史研究，仍有不可替代的意義。首先，傳記雖只記述個人生平事迹，但時代背景、社會狀況、學術思想、政治局面，都融匯其中，有利於形成整體性、連續性的歷史理解，避免碎片化的弊端。其次，研究政治人物，更直接有助於反思近代中國政治擔當者的問題。一個政治人物或集團領袖，有着怎樣的目標和主張，有無實現主張的方式和能力，有無鬥爭的意志和手段，能否聚集人才和力量，個人出入進退的選擇和性格精神對人一生的影響，都可在人物研究中加以闡釋追問。知道了主體的行動能力，方能進一步探析個人禍福成敗的根源，以及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問題。

甚麼樣的人物應為之作傳？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列舉了以下七種：第一，思想及行為與時代的關係較緊密的；第二，一生事業或性格有奇特處，發生影響或值得表彰的；第三，舊史不詳的；第四，從前史家因偏見或挾嫌記載不實的；第五，政治家列傳過於簡略的；第六，與中國文化政治關係密切的外國人；第七，近代人物中學術事功比較偉大的<sup>②</sup>。就以上幾點來看，對於顧孟餘其人，實有為之作傳的必要。

顧孟餘(1889-1972)是一個現代知識份子，早年留學德國，畢業於柏林大學。1920年代回國後，受聘北京大學德文系、經濟系，擔任主講教授兼系主任，五次出任北大教務長。同時，他又是中國國民黨政客，1926年在國民黨第二次

全國代表大會中當選過中央執行委員，後歷任國民黨中央委員、宣傳部長、鐵道部長等職。他在政治上長期追隨汪精衛，與陳公博並稱「顧陳」，是汪精衛集團(汪派)在政治上的左膀右臂；抗戰期間因反對汪對日求和，棄汪投蔣。1940年代出任過中央大學校長，1950年代在香港領導親美反共的「第三勢力」運動。論政治地位和歷史影響，顧都不算「偉大」，但他所牽扯到的各方面關係卻很重要。他畢生懷抱民主訴求，希望中國能建成一個開放、寬容的民主政體，代表了不少歐化知識份子對中國的期許。但顧一生謹言慎行，處事低調，且留作不多，為學術研究造成很大困難，故前人著述寥寥。

《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引用只註頁碼)是第一部關於顧孟餘的研究專著。本書以充實的資料、詳盡的研究，呈現顧一生的思想與政治活動，使一個歷史中忽隱忽現的身影獲得了清晰的面目。全書共八章，除導論和結論外，其餘六章分別從顧的早年生涯、作為左派要人、參與汪蔣合作、「豔電」事件前後、「第三勢力」活動幾個時期，論述其一生的思想主張與政治活動，不但填補了顧孟餘研究的空白，對於進一步了解汪派和國民黨左派的思想路線與政治性格也具有重要意義。作者黃克武先生精研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著有多部關於梁啟超、嚴復等近代思想人物的專著，故能突破一般政治史專注權力鬥爭的局限，打通思想史與政治史視野，結合思想與政治行動分析，深入研究如顧孟餘一類

從政知識份子的思想性格與跌宕人生。這部傳記至少從以下幾個方面，加深了我們對於顧孟餘與汪派的認識。

## 一 顧孟餘的革命性

本書的一大貢獻，在於對顧孟餘早期思想活動的研究。作者將他放置在民初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圖譜中，在與蔡元培、李大釗、胡適等人的比較中，論述顧對馬克思主義和當時各種社會改造方案的理解，凸顯了其思想的特點，使人們突破了以往在「溫和左派」標籤下對顧的模糊印象，重新認識其思想中的革命性。

顧孟餘是北方革命黨人。對於他早年的歷史，人們不甚了了，只知他在1926年「三一八慘案」後遭到段祺瑞政府通緝。從本書中得知，他於1910年留歐時就加入同盟會，1924年加入國民黨。1925年6月，北大經濟系學生鄧飛黃聯絡北方各省在京青年，組織「中山主義同盟會」（大同盟），是北方影響較大的青年革命組織。時任北大經濟系主任的顧孟餘，在思想、行動上對鄧產生很大影響，對大同盟也給予許多指導幫助<sup>③</sup>。1926年3月18日，北京學生和市民在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和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委領導下，在天安門前舉行國民大會，抗議日本等八國要求段祺瑞政府撤除天津大沽口國防設施的「最後通牒」，他們遊行至段祺瑞政府門前，遭到軍警武力鎮壓，打死四十七人，傷者二百餘人。次日，

政府下令通緝徐謙、李大釗、李石曾、易培基、顧孟餘等五人。顧孟餘南下，加入廣州政府（頁84-86）。

作者認為，顧孟餘關於中國改造的基本立場是資本主義式的。他推崇英國的政黨政治、歐洲的文官體制、穩定的貨幣制度、精確的貿易統計，以及鼓勵生產、增加財富和改善民生的社會政策（頁41）。他對馬克思主義持批評態度，反對歷史唯物主義和經濟決定論，強調精神的主動性，認為「歷史是人造的，人都有頭腦」，思想並不絕對受經濟因素的影響。他也反對階級鬥爭，贊成聯合互助論，認為階級的存在固然是事實，但可以在文明的發展中找到「調和的方法」。他還反對無產階級以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理論，寄望於以經濟的發展、教育等公共事業的演進，促進社會理想的實現（頁52）。

然而，顧孟餘積極支持學生示威和工人罷工，肯定以群眾運動的方式追求社會政治改革的構想，參與領導了「三一八慘案」前的抗議活動。國共分裂後，他又參加國民黨改組派，主張恢復1924年國民黨改組精神，恢復民眾運動。這顯示出顧的革命性。如何理解這一革命性，是打開中國革命的多重光譜、理解國民黨左派的意義、在中共理論之外探討中國革命可能性的關鍵環節。書中提到顧1919年5月發表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之示威運動與國民之精神的潮流〉一文（頁53），正體現了其革命性的世界觀<sup>④</sup>。

書中對該文的記述較為簡略，但筆者認為，這篇文章為理解顧孟

顧孟餘肯定以群眾運動的方式追求社會政治改革的構想，參與領導了「三一八慘案」前的抗議活動。國共分裂後又參加國民黨改組派，主張恢復民眾運動，顯示出他的革命性。

餘投身國民革命提供了線索，也為深入研究顧一生的思想變化提供了考察的起點。在文中，他首先指出，人類社會是由「內容」和「形式」兩部分組成的。生存和生活本身是內容，倫理、道德、法律、制度等維護社會秩序的規範是形式。每個時代的生活有與之相應的形式，一旦時代變遷、社會發展，舊的形式不再適應新的生活，就應被廢除。社會中人「得人人自由用其腕臂之力」，鏟除舊秩序，建立新秩序，這是「國民最高的義務」。

其次，他指出，無論是傳統的儒家倫理，還是近代的人道主義、公理、正義、守法等，都是「某時代思想趨向之表現」，只具有相對的價值。而「人之主動的活潑的理性」，才是「真道德」或「絕對的道德觀」。這裏的「理性」，指一種主動的認識與行動能力，要求破除迷信、虛偽，掃除腐化、過時的制度習俗。實現「主動的活潑的理性」的方法是「決鬥」。每經一次決鬥，人類文明就增進一步，所以最高的倫理道德是「勇」。凡能強行己之所信的，是「主動的道德」；凡以僵化的形式羈束自由理性的，是「被動的道德」。溫良恭儉讓、愛和平、守秩序，都是「被動的道德」，學生示威則代表着青年中「主動的道德之復生」，如能自由發展，不為「舊時偽道德」及「與之相類似之外國的形式的新道德」所拘束，則前途未可限量。

最後，他指出，道德為風俗所左右。風俗尚「主動的道德」，則社會中良善份子必能勇於遵循良心，與惡劣份子決鬥，使社會同化於良

善；風俗尚「被動的道德」，則社會中良善份子將為「被動的道德」所束縛，無決鬥的勇氣與能力。長此以往，社會將趨於危亡。學術思想的功能，就在於移風易俗，使社會中良善份子人人明白「真道德之實質」與「決鬥之作用」，個個能循其良心與惡劣份子決鬥，則「將來社會必可轉病弱而為強健」。

這篇文章闡發了顧孟餘的一個重要思考，即人的生存和生活具有絕對的價值，一切社會制度、倫理規範，都應建立在活潑的現實生活之上，隨着生活的變革而變遷。一旦它跟不上社會生活的發展，退化為一套僵硬的意識形態或抽象觀念，則無論是「舊時偽道德」還是「外國的形式的新道德」，都應該被拋棄。每一個有覺悟的人，應該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性，破除形骸化的社會規範加諸生活的障礙，改造制度，改造文化。這種直面現實生活、重估一切價值、打造新的政治主體、重建社會政治的勇氣和能量，就是顧所推崇的「主動的道德」，也是革命知識份子的精神特質。

## 二 顧孟餘的「理性」

理性是顧孟餘思想性格的一個鮮明特點。作為一個經濟學家，他認同資本主義的理性主義，認為對於中國的改造，封建勢力比資本主義更加可怕：「資本主義的性質。我們可以說（一）是一種『客觀主義』。他是撇開人與人的關係，而專就事實打算的，如關於成本、售價、贏利等種種的算計，統統是就

顧孟餘的一個重要思考，即人的生存和生活具有絕對的價值，一切社會制度、倫理規範，都應建立在活潑的現實生活之上，隨着生活的變革而變遷。顧所推崇的「主動的道德」，也是革命知識份子的精神特質。



客觀事實着想的。(二)是一種『合理主義』。排除不合理的習慣風俗，而以合理的方法，去求效果。……關於生產事業、無論資產費用，乃至機力人力，統統可用錢幣的數目，準確計算。」他認為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有三個主要障礙：一是「子罕言利」的道德觀念和迷信的風俗習慣；二是宗法制度、宗法思想影響，用人重視親戚朋友同鄉，而非人才；三是地方勢力的阻礙<sup>⑤</sup>。

顧孟餘的性格沉穩務實，不喜浪漫浮誇，「性剛正，尚氣節，沉默寡言」（頁316）。他的老朋友魯迅在〈在鐘樓上〉一文中，講過這樣一個小故事<sup>⑥</sup>：

也還是在廈門的時候，柏生從廣州來，告訴我說，愛而君也在那裏了。大概是來尋求新的生命的罷，曾經寫了一封長信給K委員，說明自己的過去和將來的志願。

「你知道有一個叫愛而的麼？他寫了一封長信給我，我沒有看完。其實，這種文學家的樣子，寫長信，就是反革命的！」有一天，K委員對柏生說。

「文學家」愛而跳了起來：「怎麼？……怎麼說我是反革命的呢？！」

K委員即顧孟餘，時任中山大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寫長信透露出一種閒散、抒情的態度，或許還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在緊張的革命工作中，這種態度是顧所反對的。

顧孟餘的理性，還體現在對政治持清醒的現實主義態度，以及對不同利益群體間可以妥協、協商的設想上。1927年3月，武漢國民政

府召開二屆三中全會，這是國民革命形勢最激進、前景最光明的時候，顧則表現出不尋常的理性態度。在會上討論廢除農村舊債問題時，他與惲代英、詹大悲、鄧演達等人發生意見分歧，詹認為：「國民革命是為解除農民苦痛，（舊債）不如完全取消，因損失不過少數放債人之利益。」鄧認為：舊債利息太高，利高於本，「取消則不至再有盤剝」。顧則考慮到：「取消舊債，固可解放農民，可是還需顧到：1，農民需要資本，不能立時辦到，反致金融封鎖；2，在國民政府統治之區域，恐亦不願借款，故為農民打算，是先讓借，以後再推翻，或較不讓借為好。」在討論召集省民會議的問題之時，譚延闓提出，省民會議是否與「以黨治國」原則相違背？因國民黨是以黨為中心，不是以省民為中心。顧則認為：「省民會議召集有種種必要，允許各階級利益。……民眾要求，非完全能得到，亦非完全能一致。有抵觸時，即須彼此讓步。在黨內不能此部分有利益而彼部分無利益。如廣州之工、商人衝突，由政府調解為一時的，非永久的，如議會之代表機關，則所代表為各種階級利益。」<sup>⑦</sup>

顧孟餘以理性的態度，反對中共的階級鬥爭理論，認為它依靠「激動人的情感與義憤」來「集中人的意志」，其實是以反壓迫之名，行專制之實。顧的政治設想的前提，是大多數人能有清明的理性和獨立思考的能力。然而，革命所喚起的人群和所激發的矛盾，卻是非理性的。當革命來到長江流域後，

理性是顧孟餘思想性格的一個鮮明特點。他認同資本主義的理性主義，認為對於中國的改造，封建勢力比資本主義更加可怕。他的理性還體現在對政治持清醒的現實主義態度，以及對不同利益群體間可以妥協、協商的設想上。

顧孟餘與陳公博在上海分別創辦《前進》和《革命評論》雜誌，闡發區別於中共的國民黨左派理論。顧個性謹慎，「無意廣收徒眾」，在刊物上「力求理性討論」，這種理性的態度使《前進》對於青年的感召力不如《革命評論》。

兩湖農民運動發展迅速，出現各種暴力行動。黨組織的發展跟不上工農運動的發展，黨又沒有領導全部群眾的能力。土豪劣紳、投機份子紛紛混入革命團體，破壞革命<sup>⑧</sup>，可是對他們的審判又沒有標準，有時真正的土豪劣紳偽裝成「左派」，而不是土豪劣紳的卻被錯抓或錯殺<sup>⑨</sup>。凡此都在鄉村造成恐怖現象。兩湖軍官多出身於中小地主家庭，更造成軍隊與農民協會的矛盾。1927年5月21日，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發動「馬日事變」，包圍湖南省黨部及工會、農協等機關，殺死三十餘人，釋放了所有在押的地主。之後，整個湖南陷入殘酷的白色恐怖之中。事變後的兩個星期內，被殺戮的黨部工作人員、工友、農友、學生，總計超過一萬人，殺戮的方法又是極端地殘酷<sup>⑩</sup>。在急遽爆發的階級鬥爭面前，汪精衛、顧孟餘等人採取妥協折衷的「理性」態度，對軍隊和農民運動各打五十大板，提出農工利益必須保障，過火行為必須制裁，但事實上是站在了「反革命」的一邊，縱容了地主階層和軍隊對工農的反撲。

1928年，顧孟餘與陳公博在上海分別創辦《前進》和《革命評論》雜誌，闡發區別於中共的國民黨左派理論。《革命評論》的社會影響遠超過《前進》，它批判國民黨的腐化墮落，要求黨的青年化、民主化，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嚴密黨的基層組織，受到廣大青年的熱烈擁護。陳公博被稱為「暴風雨中的海燕」(Stormy Petrel)<sup>⑪</sup>。作者則指出顧孟餘個性謹慎，「無意廣收徒眾」，

在刊物上「力求理性討論」，少有「愛而加諸膝，怒而墜深淵」的兩極化做法，顧說：「余辦刊物，只宣傳中山之主義及反共之主張，且將精選文章，不涉及人事糾紛問題。」(頁124-25)這種理性的態度，使《前進》對於青年的感召力不如《革命評論》。

### 三 顧孟餘與汪精衛

改組派中理論聲勢最高、社會影響最大的，無疑是陳公博。以往研究國民黨左派的學者，也多關注以《革命評論》為代表的激進左派路線。又因顧孟餘在汪精衛公開對日求和後，即決然與汪分離，陳則在苦勸無果後，與汪同跳火坑，這往往使人低估了顧與汪的關係，以及顧在汪派中的影響力。作者認為，顧與汪的關係遠比我們所知的更為密切，真正影響了汪的政治決策(〈自序〉，頁xv)。

1929年6月15日，汪精衛在巴黎寫信給王懋功，談控制武力問題：「若要打倒軍閥，先要以黨治軍。所謂黨者，捨總理外，決無可以個人之意思，為黨之意思。故至少限度，須用合議制，在此合議制中，武人、文人皆不當有所分別。……武人不能有絲毫挾持武力之行動，如其有之，即為叛逆，立當鋤而去之。」<sup>⑫</sup>此處的「合議制」，就是汪所說的「民主」。由此可以理解汪對顧孟餘的倚重。而顧在辦《前進》時亦聲稱：「吾輩所主張者，為反對軍事同志專政，不涉及私人恩怨……凡國民黨人，不

論其現在擁護何人，將來均可化敵為友，為吾人之政治資本。」(頁125)這一主張與汪以文人約束武人的政治訴求不謀而合。改組派工運負責人姜豪說：「當時我們這些人都贊成陳公博的理論，因為它『左』得可愛。……等汪蔣合流果真實現後，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陳公博的那些高調子，只是起宣傳作用的，真正實行的還是顧孟餘的這一套，他才是改組派的『正宗』理論家。」<sup>13</sup>

1929至1931年，汪派在「民主」口號下，聯合各派軍閥，發動對蔣戰爭：「其始是『利用』桂系和唐生智，繼而『利用』馮玉祥和閻錫山，終而和原來是死對頭、活冤家的西山會議派合作起來。」<sup>14</sup>這倒也符合顧孟餘所說：「不論其現在擁護何人，將來均可化敵為友。」美國學者王克文認為，1929年汪精衛在顧、陳的論爭中，站在顧孟餘一邊，將汪派的核心政治訴求從「走非資本主義的道路」，調整為爭取政治民主、取消反帝國主義與提倡民眾運動的立場，這意味着國民黨「左派運動」的終結<sup>15</sup>。

然而，汪精衛在對日求和的重大問題上，卻「不聽」顧孟餘的建議。不過，這其中還另有曲折。1937年12月南京失守後，顧孟餘夫婦避居香港。當時汪的秘書曾仲鳴的妻子方君璧偕汪、曾兩家老小居於香港，與顧氏夫婦過從甚密。方君璧日記中自1937年12月25日顧氏夫婦抵港至1938年12月31日，提到「教授」(顧孟餘)之處不下五十餘次。關於「豔電」(林柏生代汪精衛於1938年底致蔣介石的電報式聲

明，呼籲對日妥協)發表前後的情況，方君璧日記中亦有記載，可為本書之補充。

1938年12月29日，陳公博、陳春圃兩人將汪精衛所擬「豔電」與「致中央常務委員會、國防最高會議書」帶至香港，交顧孟餘過目。顧看後即表示反對公開發表，並致電汪：「響應近衛聲明有百害而無一利」，祈汪即電示林柏生，勿在報章發表，「餘尚有進言」<sup>16</sup>。陳公博也電汪，告知「孟餘對建議在報發表爭持極烈」。林柏生表示只擱置一日，「於三十日遵原命發表」<sup>17</sup>。本書全文抄錄了顧、陳兩電(頁181)。30日，方君璧在日記中寫道：「四兄〔汪精衛〕尚未有回電，教授急死，陳言無辦法，只好發出，因有時間，惟與日約定者。我則以為不可。但我言有何用呢！」<sup>18</sup>

12月30日夜，林柏生未收到汪精衛的覆電，即將「豔電」在《南華日報》發表。31日，汪覆電到來，囑「暫緩」。當天方君璧在日記中寫道：「四兄有覆電，曰『暫緩』，真糟透了。他們之不慎至此，實害死人呢。今晚是甚麼日子，是除夕，一年到此又完了，有何可念的呢？……今日更慘，四兄之宣言發表，全國嘩然，沒有一個報紙不罵他的。勇是勇極了，肯以一生的歷史及中國前途作孤注。我只望事可成功，則雖被人罵，救得國家亦是值得。」<sup>19</sup>同一天，方又寫信給曾仲鳴：「報紙已發表了，教授打電話去，而彼等不等覆電，幾乎將教授氣死。我恐怕將來會永遠留一裂痕在他們之間了。真可憐。今日我聽到『暫緩』兩個字，亦幾乎氣死。……實在不

顧孟餘在汪精衛公開對日求和後，即決然與汪分離，陳公博則在苦勸無果後，與汪同跳火坑，這往往使人低估了顧與汪的關係，以及顧在汪派中的影響力。作者認為，顧與汪的關係遠比我們所知的更為密切，真正影響了汪的政治決策。

方君璧日記和致曾仲鳴信清楚表明，顧孟餘的阻攔確實影響了汪精衛暫緩發表「豔電」的決定，使他重新考慮。但林柏生等人未得覆電，就先行將「豔電」發表，錯過了這千鈞一髮的轉圜之機。

知道多一日是真不可能的麼！我問了多少遍，他們都答不可，既然不可，何以有『暫緩』呢！」<sup>20</sup>

方君璧日記和致曾仲鳴信清楚表明，顧孟餘的阻攔確實影響了汪精衛暫緩發表「豔電」的決定，使他重新考慮。但林柏生等人未得覆電，就先行將「豔電」發表，錯過了這千鈞一髮的轉圜之機。黃克武在書中註釋部分徵引了一段陳克文日記：「據香港方面的傳說，汪先生的豔電是林柏生和梅思平等發表的，……汪先生被開除黨籍的消息傳到港後，柏生知已闖禍，通電話至口顫手震云。」（頁180，註釋173）現與方君璧日記相互佐證，可知「傳說」頗有根據。

「豔電」發表後，顧孟餘、陳公博都留在香港，汪、蔣雙方都對二人展開了工作。直到1939年12月，顧最終決定回歸重慶。書中說，汪的妻子陳璧君不相信顧會如此，還存有一絲如「彼餘情尚在，請出力勸回」之念（頁204）。汪則對陳說：「已遣始探顧，如何再覆。顧於仲鳴死，無一言之弔唁，其心已死，不必再注意其人矣。」<sup>21</sup>「遣始探顧」，很可能是汪遣朱始（朱執信之女，陳昌祖之妻）去尋訪顧。1939年3月21日，軍統特務製造河內刺汪案，導致曾仲鳴慘死，方君璧重傷，顧不發一言，已清楚表明與汪劃清界限的態度。與顧相比，陳公博則在1940年初陶希聖、高宗武離汪出走，「和平運動」陷入絕境時，致電汪：「弟坦白告公，弟對條件確不滿意。彼方控制中國之心，至今未衰。然公既決然犧牲，弟尚有何足惜。弟必來，請公放

心。」<sup>22</sup>一去一來，顧、陳的命運從此有別。

值得一提的是，抗戰勝利後，顧孟餘與方君璧再度相見，重拾舊誼。據說，在國共戰爭勝負將決之際，方頗有意留在大陸，徵求顧的意見。顧勸她離開，說：「新政權不是為你我這樣人建立的。」<sup>23</sup>方聽從顧的勸告，於1949年9月偕三子赴法國，後又移居美國波士頓。臨行前，方在香港同顧告別，又談起汪精衛。顧說自己「非南人，不能熱烈」，意為沒有南方人那樣熱情的性格，未能拼命勸阻汪，引為遺憾<sup>24</sup>。

#### 四 顧孟餘的「清高」

顧孟餘是國民黨中少數比較有學問、有操守的知識份子。近代中國知識份子投身政治乃普遍現象，但很多人一入官場，便沾染許多政客習氣，既不求學問長進，亦不復有知識份子的清高。也有些人雖然關心政治，但愛惜羽毛，不肯出任要職，寧位列諮詢，以「諍友」自詡。顧是既能出仕，又能保持知識份子獨立性的少數人之一。這也是作者頗欣賞他的地方，認為他能仕能隱，出處不苟，持身清廉（頁316）。

關於顧孟餘的「清高」，在方君璧日記中也有記載。1938年2月4日，方寫道：「教授本約陳公博在我們家中相見，但老陳云要去見總督，沒有空，明日始見。我去說與教授聽，並送錢與他。他們請我食飯，錢他不肯收，令我轉告四兄，說他暫時用不着，他們兩夫婦



均可愛。」<sup>26</sup>此處可見，顧雖與汪關係密切，卻不肯輕易接受汪饋贈的錢財，表現出知識份子的清高。

1938年4月8日，方君璧在日記寫道：「送信往教授處，彼云做常務委員若不能說話，即等於做傀儡。做傀儡是無論如何不做的。」<sup>26</sup>這裏所針對的，應是同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確立的新的黨政格局：選舉蔣介石為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規定總裁行使黨和國家最高權力，將全國抗戰力量集中於蔣一人領導之下。在抗戰最艱難的時刻，這一新的權力格局得到了大多數黨員的擁護。如時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秘書長的王子壯就在日記中說：「自總理逝世，黨的重心失墮，以常務委員制維持黨統者十三年矣。黨制貴能集中運用，始能靈活，……蔣先生……於抗戰艱危之日，毅然而出領導本黨十三年，本黨改組以來最重要之大事也。」<sup>27</sup>而顧孟餘卻認為，「常務委員若不能說話，即等於做傀儡」，仍堅持着汪派在反蔣鬥爭中所秉持的「黨內民主」訴求，反映了顧在思想上對獨裁體制的不同、不妥協，也算是某種清高。

顧孟餘政治生涯的最後高潮和尾聲，是1950年代初在香港領導「第三勢力」運動。作者細緻研究了「第三勢力」的思想理念、社會基礎、內部組織和政治活動。從書中可知，「第三勢力」的實質是一場依附美國的反共運動。1949年8月11日，顧在主持「自由民主大同盟」成立會議前，就先與美國駐廣州公使克拉克(Lewis Clark)聯絡，詢

問美國對組織「第三勢力」的看法。克拉克表示，他個人認為美國對於中國反共力量的出現，將樂觀其成。1951年之前，美國對「第三勢力」的支持都以個人為名義，或號稱代表「美國人民」，背後實際發揮影響的是國務院與中央情報局(CIA)。因美國擔心「台灣軍事力量不夠，政治欠民主」，將來即使反攻大陸成功，仍要走「一黨專政」舊路，故有組織「第三勢力」的必要。1951年3月，美國國務院派員赴港，表面以新聞記者身份調查遠東反共情形，實負有考察聯絡在港「第三勢力」的任務，主要工作為「搜集情報，及培植中國新興勢力」；資金來源為東京盟軍總部新聞處(頁246-47)。

1952年，張君勱為整合「第三勢力」，又約集張發奎、顧孟餘、張國燾等人組織「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戰盟)。張君勱與顧孟餘分別在美、日兩地領銜發表戰盟宣言，要求中共結束一黨專政，建立自由民主制度，軍隊國家化，落實社會福利，教育機會均等。戰盟的經費主要來自CIA。張發奎、蔡文治負責軍事；顧孟餘負責政治、組織；張國燾、謝澄平負責宣傳。成員有二三百人，主要工作是聯絡越南、韓國、北美、澳洲、印度等地華僑和反共勢力。張發奎還在港澳招募流亡青年，赴沖繩美軍基地與塞班島軍政幹部學校接受軍事訓練、組織游擊隊，發動過幾次對大陸沿海地區的突擊和空襲。1953年後，共和黨上台，美國政府轉變政策，開始積極支持台灣；加之台灣對「第三勢力」的

顧孟餘認為，「常務委員若不能說話，即等於做傀儡」，堅持着汪派在反蔣鬥爭中所秉持的「黨內民主」訴求，反映了顧在思想上對獨裁體制的不同、不妥協，也算是某種清高。

作者認為顧孟餘在國共兩黨獨裁統治之外，選擇第三條道路，旗幟鮮明地主張自由、民主。同時，他並不迴避那些對顧「不利」的資料和時人對他的批評。這種力求客觀全面，將歷史人物功罪留待後人評說的筆法，是當代史學研究最寶貴的精神。

打擊，「第三勢力」運動迅速衰微（頁255-60）。

顧孟餘1955年赴美，生活窘迫，尚須求助於門生故舊。書中說，1956年顧拜託芝加哥總領事帶信給朱家驊，表示「窘困情形，望為臂助」，後由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協助報告蔣介石，匯3,000美元給顧氏夫婦，並允諾此後每月再匯60至70美元津貼。1962年，蔣又主動請張群給顧匯去3,000美元，不啻雪中送炭（頁294）。以顧的「清高」而受此資助，可以想見其局促之境。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現代知識份子的困境：不願依附體制，又不能從事生產事業，在民間不能獨立生存，其實並無多少出入進退的空間。

作者對顧孟餘1949年以後的選擇深為讚許，認為他在國共兩黨獨裁統治之外，選擇第三條道路，旗幟鮮明地主張自由、民主，「避免了留在大陸或赴台知識份子所受到的困難與考驗，而以他自我認可的海外漂泊的方式維繫了個人尊嚴，並堅持個人的政治理念，……不愧為一個令人尊敬的豪傑之士」（頁316）。而與此同時，他並不迴避那些對顧孟餘「不利」的資料和時人對他的批評。如台灣行政院僑務委員會李樸生認為，顧「勾結軍閥官僚、追求個人利祿，有失學者身份」，在香港所為不過「借美人之垂青，在『大世界』撈翻若干名位位置而已！豈真反共乎！豈真反共乎！」（頁253）這種秉筆直書，力求客觀全面，不因史家個人立場、好惡而有所揚抑，將歷史人物功罪留待後人評說的筆法，是當代史學研究最寶貴的精神。

## 五 結語：另一種可能或不可能？

作者為顧孟餘作傳，以政治人物傳記的形式，探索中國近代政治於國共之外的另一種可能，實是希望探討中國非暴力革命與民主政治的可能。這是許多知識份子共同關心的問題，是極有意義的研究。由本書的研究，我們對顧的思想與政治性格得到兩點認識：

第一，顧孟餘的主張雖為汪派政治路線的「正統」，但細察其思想可以發現，顧、汪所追求的「民主」並不相同。顧更認同英美式的政黨政治與議會民主，汪則更要求黨內「合議制」或民主集權制。兩人的共同之處在於反對軍事獨裁與階級鬥爭，因而能於時勢之中結合成一派系。然而，在外有日本入侵、內有中共挑戰的時代，兩人所追求的文治、民主政治，實無成為「另一種可能」的可能。顧在1950年代初領導「第三勢力」運動的歷史，說明在其價值序列中，民主政治高於民族主義；反觀他在抗戰中與汪的分裂，與其說是出於民族主義，不如說是親英美路線與親日路線的分歧。

第二，顧孟餘的「清高」與汪派中的其他人亦有相似之處，可說是汪派核心人物的共同特點。筆者曾在《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一書中，論述過汪精衛既鄙視政治，又依戀政治，既以政治為實現人生價值的手段，又恥於承認自己的權力欲望，以清高自恃的現象<sup>②</sup>。

1934年，顧孟餘在鐵道部長任上遭監察院彈劾，憤而辭職。時任

副部長的曾仲鳴寫信給方君璧說：「顧先生辭職，堅不肯返部，婉勸多次，尚無效果。四兄亦甚着急。」「在未有正式部長來接收以前，我只好負責做去，真倒楣。」方對曾說：「老顧走了，我恐怕總是你倒楣，天熱如是，他還不趁機會涼一涼，何必回京受罵受氣。」<sup>29</sup>可見兩人都是以幹政治為倒楣事。曾於1927年由法國回來隨汪精衛從政時，就反覆對妻子表達自己「每作山林之想，無嗜愛利祿之心」，「我若非四兄之關係，早已隱居家鄉，閉門讀書，不問時事矣」的心志<sup>30</sup>。

在政治鬥爭中，「清高」與缺乏強烈的權力意志是一體兩面，而政治的核心就是冷酷無情的權力鬥爭，以及與之相伴隨的責任意識。正如韋伯所說：「你可以改變手段，改變環境，甚至改變基本的行動方向以及對那個方向負責的人，但你不可能把鬥爭本身撇到一邊。……用『和平』手段代替鬥爭形式，代替對敵作戰，代替作戰環境，最終代替選擇機會，那將一無所有。」<sup>31</sup>由此觀之，作者研究顧孟餘的用意，似乎不在給出結論，而在知人論事，使讀者置身於歷史之中，去思考其政治主張的可能或不可能實現。

### 註釋

① 參見約爾丹(Stefan Jordan)主編，孟鍾捷譯：《歷史科學基本概念詞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26。

②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載《中國歷史研究法 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頁204-14。

③ 鄧飛黃：《鄧飛黃自傳》(長沙：嶽麓書社，2012)，頁23-24。

④ 顧兆熊(顧孟餘)：〈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之示威運動與國民之精神的潮流〉，《每週評論》，第三次特別附錄，1919年5月18日，第1版。

⑤ 顧孟餘：〈資本主義與中國經濟之路(在中央黨部紀念周席上的演講)〉，載軍事新聞社編：《當代黨國名人講演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經濟篇，頁1-8。

⑥ 魯迅：〈在鐘樓上〉，載《三間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頁27。魯迅與顧孟餘的交往，可作為了解顧的一個線索。1926年，魯迅曾在廈門託請顧幫老友許壽裳謀職，在給許廣平信中說：「孟餘的『後轉』，大約頗確而實不然，兼士告訴我，孟餘的肺病，近來頗重，人一有這種病，便容易灰心，頹唐，那狀態也近於『後轉』；但倘若苦重起來，則黨中損失也不少，我們實在擔心。」(魯迅：〈致許廣平〉[1926年10月23日]，載魯迅手稿全集編輯委員會編：《魯迅手稿全集》，書信第二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頁66。)1927年，國民黨「清黨」後，魯迅與顧的交往並未中斷。《魯迅日記》1928年3月1日寫「訪孟漁」；1929年1月10日寫「孟餘及夫人來」；同年4月28日寫「下午同廣平訪夢漁未遇」。顧最後一次出現在《魯迅日記》中，是1934年9月27日：「得顧君留柬，下午即同廣平攜海嬰往訪之。」時顧任國民政府鐵道部長，遭監察院發動「貪污」彈劾案，又肺病發作，赴滬治疾。考慮到1927年魯迅被「清黨」的鮮血嚇得目瞪口呆，自此對國民黨「異常地憎恨」，1930年代後更與共產黨人聯繫密切，但仍與顧保持着交往，說明魯迅並未將顧視同一般國民黨政客看待。參見《魯迅手稿全集》，日記第六冊，頁15、108、130；日記第八冊，頁71。

⑦ 〈二屆三中全會第六日速記錄〉(1927年3月16日)，國民黨黨史館，會2.4/8.6。

在政治鬥爭中，「清高」與缺乏強烈的權力意志是一體兩面，而政治的核心就是冷酷無情的權力鬥爭，以及與之相伴隨的責任意識。作者研究顧孟餘的用意，似乎不在給出結論，而在知人論事，使讀者置身於歷史之中，去思考其政治主張的可能或不可能實現。

- ⑧⑩ 〈湖南請願代表團關於長沙事變經過情形第一次報告綱要〉(1927年6月)，載中國革命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編：《馬日事變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1-3；9。
- ⑨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速記錄〉(1926年5月30日)，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下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頁1223-24。
- ⑪ George E. Sokolsky, "Kuomintang Differences: The Popular Animus against the Nanking Governmen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1 August 1928, 15.
- ⑫ 汪兆銘(汪精衛)：〈1929年6月15日函〉，載馬長林選編：〈汪精衛致王懋功密函選〉，《歷史檔案》，1984年第4期，頁62。
- ⑬ 姜豪：《「和談密使」回想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頁64。
- ⑭ 胡耐安：〈談西山會議派與改組派〉，《傳記文學》(台北)，第10卷第6期(1967年6月)，頁76。
- ⑮ 王克文：《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台北：國史館，2001)，頁144-54。
- ⑯ 「顧孟餘電汪兆銘響應近衛聲明有百害無一利先生對中央建議應俟中央決定不宜再在報章發表以免公開決裂影響必惡不可收拾如承同意允諾祈即電林柏生照辦」(1938年12月29日)，〈汪兆銘投日前與政府首要函電(二)〉，《汪兆銘史料/文件/函電與函件》，國史館，典藏號：118-010100-0049-056。
- ⑰ 「陳公博電謂顧孟餘對建議在報發表爭持極烈及林柏生簽擬只擱置一日於三十日遵原命發表」(1938年12月29日)，〈汪兆銘投日前與政府首要函電(二)〉，《汪兆銘史料/文件/函電與函件》，國史館，典藏號：118-010100-0049-054。
- ⑱ 《方君璧日記手稿》，1938年12月30日，日內瓦方君璧家屬收藏。
- ⑲ 《方君璧日記手稿》，1938年12月31日。
- ⑳ 〈方君璧致曾仲鳴函〉(1938年12月31日)，日內瓦方君璧家屬收藏。
- ㉑ 「汪兆銘電陳璧君赴渝勸蔣中正事萬不可行及王道源密碼被檢盼勿再用等」(1939年12月21日)，〈汪兆銘與各方往返函電(三)〉，《汪兆銘史料/文件/函電與函件》，國史館，典藏號：118-010100-0009-009。
- ㉒ 「陳公博電汪兆銘條件已定無再討論之必要彼方控制中國之心至今未衰公既決然犧牲弟尚有何足惜擬俟政府成立時北來」(1940年2月7日)，〈汪兆銘組汪政府時各方之函電〉，《汪兆銘史料/文件/函電與函件》，國史館，典藏號：118-010100-0052-023。
- ㉓ 筆者對方君璧之子曾仲魯的採訪，日內瓦，2019年5月28日。
- ㉔ 《方君璧日記手稿》，1949年7月3日。
- ㉕ 《方君璧日記手稿》，1938年2月4日。
- ㉖ 《方君璧日記手稿》，1938年4月8日。
- 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王子壯日記：手稿本》，第四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頁431。
- ㉘ 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頁277-86。
- ㉙ 〈曾仲鳴致方君璧函〉(1934年8月8日、24日)、〈方君璧致曾仲鳴函〉(1934年7月11日)，日內瓦方君璧家屬收藏。
- ㉚ 〈曾仲鳴致方君璧函〉(1927年10月29日)，日內瓦方君璧家屬收藏。
- ㉛ 蒙森(Wolfgang J. Mommsen)著，閻克文譯：《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1890-1920)》(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頁42。

李志毓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